

农民老胡的“远大理想”

重庆市黔江区邻鄂镇松林村，一座海拔千米的山头，47岁的胡维成身着迷彩服，在给果园除草。

太阳火辣辣的，汗水湿透他的衣背，顺着裤脚一直淌到鞋里，鞋底越来越滑。他早已习惯这样的劳作，那黝黑的皮肤便是明证。

4年前，他曾是村里煤矿的生产矿长。后来，为了保护生态，煤矿关停。他到外地打了3年工，直到妻子张爱英得了乳腺癌才回来。

除了照顾患病的妻子，他流转了418亩山坡荒地，种了西瓜和黄桃。他那么深爱妻子，便给果园取名“爱英冬桃种植基地”。

胡维成像经营爱情一样，经营着这片果园。每天早上，他天不亮就起床，给妻子做早饭，送妻子去医院，随后便来到果园，给果园除草、修枝、防病害。

忙不过来时，他会请村民帮忙，每天给村民结算工钱。中午回家做好饭，再送到果园给村民们吃，饭后接着干活。

直到夕阳落山，山头笼罩着浓浓暮色，他才骑着摩托车下山，到医院接妻子回家，又马不停蹄地给妻子做晚饭。

这样的生活，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闹钟，一个环节出错，就会打乱一整天的节奏。但老胡是个准时的“闹钟”，每个环节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从不出错。

村里的干部看他忙成这样，怕他吃不消，就问他：老胡，你每天这么忙，别累坏了身体，有什么困难没有？镇里的干部也经常到果园看他，让他有困难就说。

老胡憨笑，眨眨眼说：“我没啥困难，年轻时吃点苦，老了才能享福。我打算干到60岁退休，以后就带着爱英周游世界！”

带着妻子周游世界，老胡可不是说说而已，这真的是他的“远大理想”。

他早就算了一笔账：去年光西瓜就卖了7万元；今年黄桃开始挂果，少说也能卖30万元；明年，果园开始进入丰产期，年收入50万元不成问题。再往后，除去村民工资和分红，一年起码有四五十万元的收入。

这笔稳定的收入，足以让他带着妻子，到外面看一看了。

老胡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6岁，二儿子24岁，大学毕业后都在重庆上班。他不想给儿子添麻烦，儿子们问他缺不缺钱，他总是说：我才不缺钱，你们要是缺钱了给爸说声！

老胡确实不差钱。今年的黄桃下个月才上市，但已经被订走了10多吨，每斤10元，这就是20多万元。他的果园是生态种植，水果不愁卖。

但20多年前，松林村、黔江区乃至整个武陵山区，真穷。那时，当地人为了填饱肚子，跟天斗、跟地斗，创造了“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

弹指一挥间，沧桑巨变，换了人间。但，这种精神，却一直没变。

（本报记者刘学奎、韩振）

农民吐木尔的“退休计划”

像生活在新疆南部绿洲的无数家庭一样，阿布都尼亚孜·吐木尔家世代为农。但阿布都尼亚孜·吐木尔决心改写家族历史：他本人将是吐木尔家最后一个农民。

对47岁的阿布都尼亚孜来说，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过去20多年，土地给予他的回报，远少于他付出的努力。

在干旱的新疆南部，强烈的日照给了阿布都尼亚孜黝黑的面庞，也带走了大地的水分。这里距离塔克拉玛干沙漠不到100公里，蒸发量可以达到降水量的40倍到167倍。土地的吝啬往往因为缺水，但阿布都尼亚孜的家乡却是个例外。

他的家乡在阿瓦提县，位于塔里木盆地西缘一片富饶的绿洲。和天山山脉以南的许多地区大为不同，阿克苏河、和田河、喀什噶尔河都在阿瓦提县境内流淌，水在阿瓦提不是个稀罕物。

困扰阿布都尼亚孜的是土地面积大小。阿布都尼亚孜一家5口人只有8亩耕地，还零碎地分为好几块，彼此之间相隔数百米。土地面积小、地块分散，这样的情况在当地十分常见。

“这样种地不仅不赚钱，还浪费水。”阿布都尼亚孜说。狭小的面积使采购节水滴灌设备的成本明显提升，而零碎的地块又让大型农用机械派不上用场。

拿干旱区最常种植的棉花为例，在阿布都尼亚孜用土渠引水浇灌的农田，棉花产量约300公斤/亩。但距离他家乡70公里的阿拉尔垦区，那些使用滴灌技术、种植在大块条田里的棉花，产量在400公斤/亩至500公斤/亩。

“同样一亩地，我们产量少不说，一年消耗的水还比别人多了200立方米。”阿布都尼亚孜叹了口气。水费在当地比较低廉，他并不是为此而沮丧。

水资源的过度开发，曾经令新疆人民的“母亲河”塔里木河下游出现断流，引发过严重的生态危机。但塔里木河下游距离阿瓦提的直线距离超过500公里，农民鲜有机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我没去过塔里木河下游，但见过其他河流下游断流后的景象。胡杨、梭梭都死了，到处覆盖着厚厚的流沙，那样子令人绝望。”阿布都尼亚孜回忆说。

土地让人灰心，但大部分乡亲却离不开土地。“因为他们总是害怕，害怕语言不通、害怕没有其他技能……”总之，他们因为害怕没有离开过这里。”

阿布都尼亚孜可不这样。他在12年前就只身一人跑到河北邯郸打工，卖烤肉的间隙还顺道去了趟首都北京。

“我在那儿学会了普通话，喜欢去热闹的市场逛街。要不是和老板吵架赌气回来，我或许会一直待在那里。”这个勇于改变的中年男人压低帽檐，没再说下去，显得有些低落。

直到谈起孩子，他的脸上才重绽笑容。按新疆南部农村的传统，老汉要把土地以及农民的身份交给儿子继承，但阿布都尼亚孜不这么干。

“我从不让孩子们下地干活，就让他们好好读书，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如此。现在他们要么做生意，要么在外地打工，没一个务农的。”他微笑着伸出自己那双粗大、布满老茧的手说，“让儿子接班？他的手比女人的手还滑溜，拿不稳坎土曼（锄地用的铁制农具的）！”

至于他自己，他准备到了60岁就彻底离开这块土地。新疆南部一场关于土地的变革正“小荷露尖”，它将帮助阿布都尼亚孜把这份长远规划变为现实。

针对人均耕地面积小、细碎化程度高、农业生产落后的现状，新疆南部多地政府、农业合作社和企业正通过土地流转，加快土地经营规模化进程，帮助这片古老却贫困的土地走向现代化。

“到时候把地流转出去，过退休生活。”阿布都尼亚孜说。

（记者张晓龙、李志浩、阿曼）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安徽天长：“清单+积分”管住村级微权力

新华社合肥7月3日电（记者姜刚、吴慧瑛）“村里的水库通过公开招标重新发包，最终中标价一年有4.2万元，是过去的28倍，超出了我们的意料啊！”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新街镇兴隆社区居民曾桂华高兴地告诉记者，过去水库发包不太规范，一般都是村里指定包给谁就给谁，现在口袋里把规则写得清楚，这样办起来就规范了。

曾桂华说的口袋书是新街镇印发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和运行规范》口袋书。

“过去，村里虽然有村务监督委员会，但对村干部的作风和权力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很难发挥监督作用。”新街镇党委书记李正军说，为此，该镇创新监督方式，从小微处着手，对村级权力进行梳理，从2015年开始实施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

如何申请低保户、村集体资产怎么发包、选后备干部有什么流程等多项村级事务工作都被细化，列在了口袋里。新街镇将村级权力细分为“三资”（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工程项目、物资采购和公共服务等6大类26项，对每项小微权力运行都列了清单，画出了流程图，给出了说明书。

尽管把村级小微权力列清楚了，但遇到村干部互相推诿怎么办？村干部对各项工作被动应付、避重就轻怎么办？2016年，新街镇对村两委干部配套建立小微权力责任清单，明确了村党组织书记10项、村委会主任8项、村两委副职干部3项责任清单。同时，制定村干部权力行使10项负面清单，强化廉洁自律意识。

“对于权力责任清单制度，一开始我是有抵触情绪的，原来村里很多事情都是我说了算，现在给我上了紧箍咒，思想上不太能接受。”一位村级党组织负责人说，通过几年来的运行，村干部按照权力范围、运行流程等开展村级事务工作，“让村干部的工作更好干了，群众更放心了，同时也从源头上遏制了小微腐败，保护了村干部。”

村级小微权力的规范运行，不仅打破

新华调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治力度。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乡村干部权力任性，损害群众利益。专家学者建议，要加快落实指导意见的相关内容，规范小微权力运行，建立健全小微权力监督制度，织密基层权力运行“廉政防护网”。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强农惠农“真金白银”越来越多。“苍蝇式”腐败也时有发生。

——虚报冒领比较突出。部分基层干部利用机制漏洞，把惠农资金当成“唐僧肉”。如贵州省黔南州大塘场镇三角庄村原村支书陆安江，假借别人养殖的50只羊冒充自己的养殖数，于2012年虚报套取国家种羊养殖补助款1.5万元。

——“雁过拔毛”影响恶劣。一些村干部想方设法从各种惠农资金中“拔毛”，以各种名义向群众收费。湖南江永县上江圩村原村文书欧养仔利用管理公章的权力，村民建房、转学、转户口、打结婚证盖章，大都要收费；利用临时保管村民社保卡的机会，从38本社保卡中取走34200元养老金据为己有。

了长期以来村干部的“一言堂”，也大大节省了村里的办公费用。“现在各村购置500元以上的办公用品，都要严格按照清单上制定的流程购买。”李正军说，这几年，该镇日常办公费用开支每年呈20%的下降。

乡村“廉政防护网”如何织密

——侵占挪用扶贫款物。2016年6月至2017年1月，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高楼坪乡羊尾舟村主任梁巨宽在任高楼坪乡羊尾舟村委员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建成并已报账的“一事一议”通组路项目，重复向乡财政分局申请报账5.03万元、领取项目水泥120吨（折合人民币3.34万元），共计8.37万元占为己有。

有关专家指出，近年来，虽然相关法规制度建设正在逐步完善，但是作为权力末梢的小微权力点多面广，单纯依靠上级部门实现全方位有效监管，确实有困难。

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陈文胜认为，公共决策过程、惠农项目和资金使用等信息难以公开透明，给小微权力留下了腐败空间。对待惠农项目和资金，上级职能部门普遍重下拨、轻监管，项目和资金下拨到村里，相关信息公开不到位，容易发生腐败。

涉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参与部门较多，容易出现职能交叉、彼此推诿的现象，监管工作难以落到实处。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吕德文建议，要尽快织密农村基层权力运行“廉政防护网”，大力开展农村基层微腐败整治，严肃查处侵害农民利益的腐败行为。

一是明确每项小微权力行使的法规依据、运行范围、执行主体、程序步骤。过去，部分乡村虽然有村务监督委员会，但对村

干部的作风和权力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监督作用难以发挥。惠农补贴项目多，涉及面广，必须对每项小微权力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的操作流程，一旦出了问题可以溯源追查，追查到人，倒逼村干部强化自身约束，压缩其灰色空间。

部分地区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村里鱼塘承包应该走什么流程，村里低保户和贫困户如何评选，村民迁户口、村里采购都有什么程序，每名村干部各自负责哪些具体事务……全部进行了细化，列出清单，进行了公布，既能防止推诿，又能倒查追责，强化廉洁意识。

二是逐步强化乡镇一级纪检力量，通过优化队伍建设、突出纪检人员抓主业、制度保障乡镇纪委独立性、强化经费设施保障等，理顺乡镇纪委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基层的执纪审查力度。

三是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和应用，推动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压缩基层腐败的空间。吕德文表示，近年来，比如通过大数据比对，贫困户、低保户的评比越来越规范，尽可能地避免了错评漏评。再比如有的乡村探索村级公务卡，将原先村里使用现金支付结算的办公费、会务费等开支，统一纳入公务卡进行支付结算，将村务公开由过去的“无据可查”转变为留痕化、实名制管理。

（记者周楠、向定杰）

新华社长沙7月4日电

新街镇，“清单+积分”管理新模式在全市推开。“据悉，今年6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为各地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借鉴，天长市“清单+积分”防治小微腐败入选其中。

据天长市纪委书记张桂松介绍，不仅

“为鼓励村干部善作为，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在实施小微权力责任清单基础上，我们探索实施了‘清单+积分’管理新模式。”新街镇党委书记唐家妹说。

据天长市纪委书记张桂松介绍，不仅



7月1日，东梓关村的渔民驾驶渔船前往富春江捕捞区域（无人机拍摄）。

当日，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江干流富春江迎来了开渔的喜庆日子，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东梓关村的渔民驾驶渔船开始捕捞江鲜。

东梓关村有1000多年历史，水陆交通方便，自古就是富春江江南重要的商贸集散地，素有富春江“东流第一关”之称。

随着近年来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东梓关村依托富春江丰富的江鲜鱼类资源，在开渔时节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富春江渔民丰收的喜悦和江南古村的独特魅力，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渔村开启「丰收季」

“台九鲜”助力产业旺 “土导师”带来大变化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王俊禄）六月江南杨梅红。清晨天色微亮，刚刚采摘下的浙江仙居杨梅搭乘“飞的”，运往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有“仙梅”之称的仙居杨梅，海外订单一年多过一年。

在长三角重要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浙江台州，杨梅、蜜橘、西瓜、青蟹等特色农产品随季节不断呈现，18个农产品规模产地获“中国特产之乡”称号。台州近日启用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台九鲜”，进一步擦亮“农字牌”，抱团闯市场。

在台州市天台县寒山生态葡萄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葛凌腾正在查看葡萄长势。这位“葡萄大王”自创了数字化生态精致栽培新模式，高品质葡萄受到市场欢迎。葛凌腾说，每亩葡萄平均产值6.82万元，而实行“二次果”技术的果园，每亩产值能达到12万元。

梅花飘落，弹珠大小的柑橘青果挂满枝头。“不要小看田间地头老农，说不定就是国内一流的柑橘种植专家。”台州临海农技部门负责人说。

二十世纪初，临海的柑橘几毛钱一斤；这些年，最响的品牌卖到50元一斤。一个大众化的水果身价翻了几十倍，无论科技化、标准化探索，还是合作化、精品化之路，人才是最厚重的底色。

除了培育乡土人才和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去年以来，台州各县（市、区）分别与同济大学等国内10余所高校共建乡村振兴学院，“教授下乡野，课堂在田头”，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人才支撑。

品质，始终是打响品牌的底气。据统计，台州拥有水果、水产、蔬菜、茶叶、中药材、粮油、食用菌、笋竹、畜禽等九大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已注册农产品商标8200件。

在浙江三门湾的滩涂上，到处爬着一种青蟹，但早些年谁也没有拿它当回事。1997年，因百年不遇的台风，三门沿海的田地海水浸泡40多天，粮食、柑橘、棉花等农作物短期内无法再种植，人们开始试着养殖青蟹。

顺势而为，当地政府做了两件事：一是技术攻关。三门发动养殖户联合科研机构进行养殖技术攻关，探索出单养、混养、轮养、套养等多种养殖模式，大力推广健康养殖，青蟹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二是搭建平台。建成青蟹专业市场，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扩大知名度。

如今，“三门青蟹”获中国驰名商标，还走出了国门。“台州推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就是要让最优质的台州农产品遴选入选‘台九鲜’公用品牌。”台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新华社福州7月4日电（记者邵晓安、陈旺）全村没有一条水泥路，家家户户污水直排，十几户人家尚未脱贫、村财囊中空空；村部的木窗户朽烂了，台风天风雨不停往房间里吹……林琼顺2015年上任上楼村书记时，接手的便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上楼村位于福建泉州泉港区，村子虽处沿海却不靠海，而且土地紧缺，长期以来发展受困。更要命的是，上楼村是周边出了名的软弱涣散村，多年来，不少群众都对上楼村失去了信心。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关键在强村班子。”泉港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施德林说，为壮大村级“领头雁”的“雁阵”，培养扶持更多乡村振兴带头人，2017年起泉港区在全区推行“村支书导师团”制度。“导师团”首期聘任12名政治素质优、工作经验足、群众基础好的村主干作为导师，挂钩联系14个村（社区）进行点对点传、帮、带。

上楼村也成了扶助对象。根据上楼村的特点，“导师团”安排了有丰富产业发展经验的导师张如庆和林琼顺结对子。

张如庆和林琼顺的想法一致，上楼村要发展，得先树信心、正风气，尤其要先干成一两件提士气的事情。两人商定先从改善村里的卫生环境和移风易俗开始。

张如庆带着林琼顺一起跑政策，多方推荐担保，终于争取到资金，帮助上楼村在全区建成首个村级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系统，村里原本集污纳垢的臭水塘改造后成了茶水休闲广场。林琼顺又在村里到处粉刷上艺术画，上楼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为周边村民的广场舞新据点。

上楼村是后进村，但攀比之风盛行，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张如庆和林琼顺认为，这一风气一定要改。但要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却并不容易。好在张如庆此前就有过移风易俗的成功经验，他召集上楼村的老人一起开会，讲述身边厚养薄葬减轻子女负担、赢得村民叫好的案例，让大家放下了思想包袱。

此后上楼村每家办红白喜事，村两委都提前介入，监督村民减少流程、压缩开支，丧事的花费明显减少。

在上楼村村部里，林琼顺拿出一本规划设计图满怀憧憬：“上楼村最大的资源就是靠近镇区。”

谈起身边的导师来，林琼顺说，原来以为“村支书导师团”就是个架子，现在看来“导师团”里虽然都是乡村“土导师”，但是他们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给村里带来了大变化，发展农村的本事“真管用”。